

下户出钱:宋代南方水利募捐主体的再认识

祁琛云 苗书梅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两宋时期,基层农田水利建设资金以民众自筹为重要来源,而从事农业生产的乡村下层民众是水利兴修经费的主要承担者。水利设施周边的食利民户及其他名不见经传的基层民众,通过参与地方政府主导的官民共筹、民众分摊建设经费、向官府或私人借贷及自发集资等方式,被动或主动地参与基层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经费的筹措。正是在广大下层普通民众的大力支持下,尽管宋代地方政府财政普遍紧张,但农田水利事业却始终保持着持续向好的发展势头。

【关键词】宋代;农田水利;众筹;南方民众;水利资金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2)03-0077-10

The Money Comes from the Next Account: Reconceptualizing the Main Body of Water Fundraising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QI Chen-yun MIAO Shu-me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Abstract: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people raised their own funds to fin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nd the general public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ere the main contributors to the cost of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The people in the vicinity of the water facilities and other unknown peopl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re actively or passively involved in fin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tion facilitie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by participating in local government-led public-private funding, sharing the cost of construction work, borrowing from the government or private individuals and raising funds on their own initiative. It was with the strong support of the general public that, despite the general financial constraints of local government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he grassroots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tinued to gain momentum.

Key words: Song dynasty;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crowd funding; people of the south;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funding

关于宋代民众的类型,学界多有探讨^①。学者们根据民众的身份与社会地位、拥有的财富与文化知

[收稿日期] 2022-01-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代中国乡村治理与社会秩序研究”(18ZDA171)

[作者简介] 祁琛云(1977—),男,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宋史;苗书梅(1963—),女,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宋史。

① 参见林文勋的《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刁培俊的《宋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2期)、谭景玉的《宋代乡村社会的多元权威——以民间纠纷的调解为例》(《江淮论坛》,2007年第1期)、廖寅的《宋代两湖地区民间强势力量与地域秩序》(人民出版社,2011年)、祁琛云的《宋代民间力量及其在地方建设中的贡献》(《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5期)等论著。

识,将其划分为富裕民众、知识精英、民间权威和下层普通民众等不同类型。本文涉及的乡村基层民众便是其中的一种类型,一般泛指从事农业生产的所谓食利民户及文献中经常出现却未书其名的普通百姓,如邑民、里民、乡民、农民、乡人等。在以往有关民众参与地方公共建设的研究中,多认为建设经费主要由富民承担,如长期研究宋代富民阶层的林文勋指出:富民通过出资办学、赈济灾荒、兴修水利等,在乡村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①。黄宽重也指出: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地方财政日趋紧张,“各地的公共建设与文化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当地的士人与富豪,而富人是主要的赞助者”^②。康武刚在探讨温州地区水利兴建经费来源时,称富民、乡绅、世家大族等集资是当时最广泛的水利建设资金筹集方式^③。可见,宋代富裕民众作为农田水利等公共建设出资者的身份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不过,据文献记载,作为水利工程的直接使用者和受益者,广大乡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基层普通民众,才是水利建设经费最重要的承担者。宋代乡村普通民众由于大多依赖水利设施进行农业生产,故相对于其他建设领域,其参与水利创修的积极性更高。基层民众或通过自发集资,或在官方督劝下捐资兴修水利,而生活在水利设施周边的食利民户则通过自筹或向官府赊贷,或以私人借贷等方式众筹建设经费。

本文所涉及的乡村普通民众,不可避免会包括部分富裕民众在内,因为文献记载不可能将普通民众与富民完全剥离。笔者能做到的就是尽量避开那些已经明确包涵有富裕精英参与其间的例子,相对单纯地探讨作为群体的基层普通民众在水利建设经费筹措中的贡献。

一、宋代水乡地区官民共筹水利经费

虽然宋代律法规定,农田水利建设“合是民间出财”,同时由于政府财政紧张,地方水利建设经费也的确多依赖于民众自筹。不过由于水利设施修建耗资巨大,民众自筹又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此在一些大型工程的建设中,地方官除了想方设法动员百姓出资出力外,还需要争取官方资源,由此而形成官民共同筹集建设经费的模式。如神宗熙宁初,通判越州的曾巩在《越州论修海塘别纸启》一文中向上司建议,由官民共同筹措修建海塘的费用。他说:“海塘人工物料,计当费钱数万缗,若全出于民,盖不能办;若全出于官,又官用亦不能给。为可行之计,此常岁民但当自修营,今岁官须助之耳。故止敢以钱二万缗,能全给此役也。……若无钱,即已其工料,官为出得若干以代下户。其余即令上户自出,然后随诸县合得钱数分给。”^④由曾巩之言不难看出,越州海塘的修建维护主要由民众承担,然而修造工程耗费巨资,民众难以独立承担,需要官方出资襄助。这种以民众自筹为主、官方调拨为辅的筹集方式,是宋代江南地区水利建设经费筹集的基本模式之一。曾巩之后,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沈括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八月,检正中书刑房公事沈括奏称:“浙西诸州水患久不疏障,堤防川渎多皆堙废。今若一出民力,必难成功。乞下司农贷官钱,募民兴役。”^⑤沈括的话从侧面反映了两浙地区水利工程建设主要由民众来承担,因为积弊过深,工役过大,请求让官方也参与出资募民修治。

北宋中期,著名水利专家单锷在分析苏、常、湖三州水利形势时,指出“州县惮其经营,百姓厌其出

① 林文勋:《中国古代的“富民”阶层》,《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2期。

② 黄宽重:《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③ 康武刚:《南宋东南沿海地区水利修筑的经费筹措——以温州地区为例》,《传统中国研究集刊》2014年第1期;《宋代温州滨海平原水利开发的经费来源与筹措方式探析》,载魏明孔、赵学军主编:《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探索:首届中国经济史博士后论坛论文精选集》,九州出版社,2015年;《宋代浙南温州滨海平原埭的修筑活动》,《农业考古》2016年第4期。

④ 曾巩:《越州论修海塘别纸启》,转引自金程宇:《新发现〈永乐大典〉残卷中的曾巩佚文》,《学术月刊》2004年第9期。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六,熙宁六年八月丁丑条,中华书局,2004年,第5990-5991页。

力”是该地区水利不兴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建议官民分工协作,分别提供经费,共同加以修筑,如此一来,官民均有承担,不至于独立难支,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针对地方政府财政紧张、难以调拨充足经费的问题,他指出应积极利用民间财力,称“开三州诸沟渎,不必全藉官钱。盖三州之民憔悴之久,人人乐开,故半可以资食利户之力也”。他进一步举例分析,建议限定官钱民财使用的范围,即“若开江尾疏吴江岸为桥,迁吴江岸东一村之民开地,复为昔日之江,置一十四处之斗门,并筑一十四条堤制水入江”等大型工程,“非官钱不可开也。”而若修筑“宜兴之横塘、百渎,苏州之海口诸浦、安亭江,江阴之季子港、春申港、下港、黄田港、利港,宜兴之塘头渎,及诸县凡有自古泄水诸沟港浜渎”等小型水利设施,“尽可资食利户之力”^①。官民相互推诿是基层水利建设中最常见、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单铎根据水利工程的规模与建设的难度,建议分为官方建造与民众修筑,使官民权责分明,各负其责,既有利于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与民众的劳役负担,又能提高效率,保证工程建设质量,不失为兴利除弊的良策。钦宗靖康元年(1126),处州剑川县重筑蒋溪堰,知县姚某筹措缗钱一百四十余万,并令“占田者随亩乐施,以佐其费”,又将财用出纳之权交给邑僧清竦,“命工采石,绝流为堰。”^②时值宋金交战的纷乱之际,剑川县官民不受战乱影响,共同筹资兴修水利,力保一方太平,这与因战争而湮废大量水利工程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

南宋高宗绍兴十六年(1146),明州它山堰毁于飓风海啸,据时人魏行己描述称:时值“农事举趾,而它山之堰,缘飓风忽起,潮汐冲突,川淤堤垫,堰埭隳圯,七乡民田,将就枯涸,海波江鹵,駸駸弥漫。”它山堰是明州地区非常重要的水利工程,一旦毁损不修,直接影响当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故一经决堤,“环境之民惶怖忧恐”。灾情发生后,知明州秦某紧急征调“公帑私财”,委督官吏,“经营强堰”^③。在官帑民财的支持下,它山堰很快修复如初。孝宗淳熙初,两浙转运副使赵礪老在请求浚治临安府附近漕河的奏章中提出,由朝廷调拨钱粮,弥补漕河两岸民户所出工费之不足。他说:“临安府长安闸至许村巡检司一带,漕河浅涩,未曾开浚。除两岸人户自出力开浚外,势须添人并工开浚。约用钱一万五百余贯,本司管认应副外,合支米二千三百六十二石五斗,乞于朝廷桩管米内给降。”^④赵礪老的请求获得朝廷允准。同时期,瑞安县重修石岗斗门,除官府调拨的七十万钱外,“知县事刘龟从又劝得民钱六十万”以助工费^⑤。该工程也是官民共筹建设经费的典范。另如温州城外的南塘久废不治,“遇时潦,咫尺不得进,往往溺死”,严重影响交通与农业生产。淳熙间,名臣沈枢任知州,“邦人亟请于州,于部使者”。沈枢召集通判等商议经费之所出,称如果使“吾民镛聚铄窃自支补,甲前而乙却也。”如此一来,不仅迁延误时,非短期内能办到,而且徒增民众的负担。因此倡议由官方先出资兴建,为民间做表率,于是“前太守李公以钱三百万,提举勾公、岳公继以米四百斛,倡民兴之。民亦输钱累至四百三十二万”^⑥。官民合力共筹,建设资金充盈,多年积弊一朝去之。

孝宗以后,随着国家财政日趋紧张,民众负担不断加重,各级政府为避免激化基层矛盾,在设法调动民众出资兴利的同时,也多方筹集建设资金,于是官民共筹水利兴建经费的模式广泛运用于南宋中期以后的基层农田水利建设中。如光宗绍熙元年(1190),兴化军修复陈坝斗门,“靡金钱余四百万,请于常平司得四之一,复撙节他费以足其用,均于民者特旧之半”^⑦。宁宗庆元初,余姚县修筑捍海大堤,由于工

① 单铎:《吴中水利书》,张国维编著:《吴中水利全书》卷一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17、524页。

② 周庄:《蒋溪堰记》,同治《龙泉县志》卷一二,《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浙江省》,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84年,第626-627页。

③ 魏行己:《重修增它山堰记》,魏峴撰:《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4-35页。

④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六之三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606页。

⑤ 陈傅良:《陈傅良先生文集》卷三九《重修石岗斗门记》,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93页。

⑥ 陈傅良:《陈傅良先生文集》卷三九《温州重修南塘记》,第494-495页。

⑦ 傅洪:《陈坝斗门记》,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莆阳志·水利》,中华书局,2004年,第1121页。

费浩大,除官府筹集经费外,民众也积极捐助。据楼钥《余姚县海堤记》载:余姚旧有长堤蔽遮民田,“无风潮冲决之患”,南宋以降,年久失修,以至于“故堤荡尽,为害甚酷”。庆元二年(1196),在知县施宿的推动下,开始重修大堤,“约费甚重,邑不足以供,列于府于监司”,路、府、县三级政府共同筹资,“邑之士夫与其乡人助三百万”补其不足。在官民通力合作下,废坏百年的大堤得以重建,“并海之田始尽可以无虞矣”^①。嘉定年间,庆元府浚治东钱湖,朝廷出“内帑五万缗、义仓米一万石”作为开湖之用,而“本府均官民户有田之家,出人夫器具,又差拨水军同共搬葑积于湖中”^②。以上均为宋代各级官府联合民众共同筹集水利建设经费的典型例子,从中可以看出,虽然官府参与其中,但大部分经费还是由广大民众筹措提供,进一步体现了普通民众在地方水利建设中的重要贡献。

二、宋代基层民众出资分摊建设费用

在宋代基层水利建设中,除了官方主导下的官民共筹建设经费外,地方官员因势利导,劝率食利民户集资分摊水利兴建工费。一来可以减轻官方行政与财政压力,二来一旦修造完工,民众可共享其利,这是典型的官督民办模式。由于公私两便、利国利民,因此在官方督导下由当地民众分摊工役的方式,成为两宋时期官府着力推行的水利建设模式。

早在北宋仁宗景祐初,朝廷即下令各级官吏督劝民众集资兴修水利工程,其曰,“天下旧有陂塘沟洫久废,而长吏、令佐能劝民兴修,及辟荒田增税额至百千以上者,当行甄赏”^③。类似的诏令在两宋时期不断颁布,目的就是调动地方官劝导民众兴利除弊的积极性。在朝廷的推动下,地方官督劝百姓出资兴利的积极性很高,且成效显著,当时大量水利工程都是通过官督民办的模式兴建的。如仁宗嘉祐年间,太子中舍、知无锡县事陈经负责为常州开修运河,“疏导太湖水势,通入运河”,获利甚博,然“缘近河两岸民田到水沟洫及合置堰闸去处并未开修”,不利于当地水利事业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陈经极力“劝率人户,下手兴工,大段开掘沟港数处,通彻运河及创置堰闸。”在官府的督劝下,食利户分摊工役,集资兴利。由于陈经对当地水利建设所做的突出贡献,颇受民众爱戴。据时任常州知州陈襄奏称,当朝廷对移陈经知婺州兰溪县的敕令颁下后,“举县皇皇,如去父母,不住经州告诉,乞留满任,以此见陈经之为邑,实有惠利,使民不忍其去”^④。官方督导、民众承办的模式虽然普遍存在且颇见功效,而一旦组织不力,或官吏从中牟利,则会演变为对民众的盘剥,名为兴利,实则增加民众的负担。陈经之所以广受民众爱戴,正是因为他组织有方,慎用民力的同时获利至广。

官方督劝、民众集资或分摊建设费用的模式,在王安石推行农田水利法期间得到广泛实施。如神宗熙宁期间,梓州路转运判官李竦向朝廷报奏其任太湖知县时劝民兴修水利等事宜,重点介绍了劝谕百姓出资兴利的经验。他说:

臣前任知舒州太湖县日,访问诸乡民田有边临溪江者,频岁力耕疾种,不潦则旱,体问得皆有古来堤堰蓄泄水势,或因积年大水决溃,因循不复修葺。臣因乘其农隙,劝募傍近地主,备工料兴筑。民俗始未坚信,粗亦勉从,凡筑成堤岸数处。次年积雨,溪江暴泛,赖新堤障,遂免漫溺。自昔不植之地,一旦遂为膏壤。由是令复加增葺,众始悦随。^⑤

① 楼钥:《楼钥集》卷五六《余姚县海堤记》,江浙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14-1015页。

② 程覃:《乞浚治东钱湖淤葑札子》,《宝庆四明志》卷一二,《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5151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七,景祐二年十二月丙子条,第2768页。

④ 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一六《知常州乞留陈经不对移任满状》,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第779-780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八,熙宁三年十二月甲子条,第5295页。

李竦详细陈述了其在太湖督劝民众兴利的过程。太湖作为水乡,水资源丰富,全靠堤塘堰坝进行蓄泄,然而旧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很难发挥作用。李竦劝募民户自备工料物资加以兴修,虽然是工出于少数而利在大众的公益行为,但是民众的积极性并不高,因慑于官方权威,才勉强应令而为之。堤岸修筑成后,果然有利无害,于是食利民户悦从而增修。

像李竦遇到的这种情况在宋代基层建设中十分常见,水利、学校、桥道等公益性较强的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并非紧贴民众个人利益,因而参与度并不高,地方官往往通过各种方式加以诱劝督促,甚至使用强制手段,鞭朴相加也在所难免。这一点从李竦后面的说法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他称其调离太湖时,所修水利“十未一二,以天下计之,遗利固亦多矣。”因此建议朝廷“特诏郡县委长吏令佐,访求境内有古来陂堰积年毁坏荒废者,并诸色人,具利害兴修次第,指陈官司预行计置,俾因岁丰农暇,据占植地利人户,以顷亩多少为率,劝诱备工料兴修,或量破广惠仓斛斗以充口食,不得以威刑驱逼,并专行觉察公人、耆保等接便搔扰。”^①从李竦提出州县长吏劝民兴修水利时莫要“威刑驱逼”的建议可知,鞭朴相加、威刑相逼应该是督劝民众从事地方建设的常见手段,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各类建设《记文》所记载的地方官吏柔声开导、广大民众不劝自来的和谐氛围,不过是文人士大夫有意粉饰的结果。

南宋初期,受战乱影响,江南各地水利工程湮废不治,农业生产受损严重,而随着地方财政困难程度的加剧,政府无暇顾及农田水利的兴建,急需地方官督劝百姓出资创修水利,当时多位官员向朝廷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如高宗绍兴八年(1138),侍御史萧振奏请朝廷诏令各地州县官访问辖区内“陂塘堰埭民田共取水利去处……随其土著,分委土豪,使均敷民田近水之家,出财谷工料,于农隙之际修焉,县官董其大概而已。”^②绍兴十六年(1146),前知袁州张成己奏称:“江西良田多占山岗上,资水利以为灌溉,而罕作池塘以备旱暵。望令江西守令,俾务隙时劝督父老相地之宜,讲究池塘灌溉之利,以为耕种无穷之资。”^③绍兴十九年(1149),户部员外郎周庄仲也奏称:“浙西积水之患,平江为甚……积水之处,皆昔日膏腴之地。望委常平官督责,令佐多方劝诱修筑成田。如民户不来,即官为拘收,召人请佃。如此人当自勉。”^④苏州一带因为积水导致农田严重减产,身为户部官员的周庄仲奏请朝廷责令地方官督促劝导民众修筑圩田,如果诱劝不成,则采取强制手段,将积水之田籍没入官,由官府统一招人修筑佃种。孝宗淳熙二年(1175)七月,浙西提举薛元鼎在视察太湖水利后奏称:“太湖之水,独泄以松江之一川,其势有所不胜受,并湖数州皆受其害。景祐间,范仲淹尝就常熟、昆山之间浚五大浦……以杀其势,为数州之利。比年并皆湮塞。前任提举陈举善劝谕人户,以渐开浚。独许浦正是泄水去处,并未施工。”^⑤陈请朝廷诏令地方官,乘农隙劝诱民户协助太湖水军加以浚治。以上官员针对不同地区农田水利的实际情况,从不同角度向朝廷提出了由地方官督劝引导百姓出资兴建水利的建议。

在多位官员呼吁下,曾在北宋中后期农田水利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官督民办的经费筹集模式,广泛应用于南宋中前期江南地区的水利创建中。如在孝宗乾道初昆山县开塘浦的工程中,知县李某通过多方督劝,充分发动民众集资支持工程建设。据范成大《昆山县新开塘浦记》载:官府按农田令甲“若劝分所得,为之糗粮,扉履畚鍤,号召前仰哺者,一夕麇至。”前后调“用民之力役凡十有三万四千六百有奇,糜缗钱一万二千有奇……而官储不知,公徒无所与焉。”^⑥昆山新开塘浦工程所需之劳动力、经费及各项物资,也几乎全由当地民众分摊。淳熙二年(1175),台州黄岩县创修官河等水利设施,县令孙叔豹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八,熙宁三年十二月甲子条,第5295页。

②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一〇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518页。

③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四六~四七,第6140页。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九,绍兴十九年六月辛亥条,中华书局,2013年,第3020页。

⑤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一二四,第7533页。

⑥ 范成大:《范成大集》卷三八《昆山县新开塘浦记》,中华书局,2020年,第666页。

“劝谕食利之家自行兴工,开浚八乡官河九十余里。置立斗门、堰闸五所”,灌溉良田上百亩^①。明州慈溪县西北有水出群山间,迤而东来,“抵彭山而入于江。濒江旧有闸,启闭以时,遇霖潦则泄之,潴其余以备旱暵,西乡实受其利……岁久闸废,水无所蓄,旱则仰潮汐,乍盈易涸,民劳滋甚。县河浅淤,菰蒲丛生,居民因侵其旁艺木筑室,日就湮微。”当地官民欲加重修而未能成功。孝宗淳熙中,浙东提举方岳“按行郡邑,首询利病,县人合辞有请,乃下其事,使亟图之。”县主簿赵汝积领命兴治,“告谕父老,训率子弟,莫不劝趋。凡田于西者,亩出钱三百,首建闸于彭山,先为长堤以捍江潮。撤故闸余址,悉以石为之”。西乡之利既兴,汝积又捐金钱为之倡,再兴浚河之役,民众颇受鼓舞,“上下交孚,于是家自为役,不待程督”而自发出资浚治^②。官方积极倡导,民众出资出力响应,故虽然连兴大役,却能在官无重费、民无怨声的情况下顺利完工。同时期,金华县丞江士龙劝民众修缮境内陂塘堰闸等水利设施,“令耕者出力,而田主出谷以食之”。创新官私塘堰及湖泊八百三十七所,“于官无所费,于民不告劳”^③。

朱熹任浙东提举期间,为发展当地水利事业,专门贴出榜文,劝谕百姓乘农闲之时开浚陂塘,其《劝谕筑埂岸》文称,“今晓示农民,火急趁此未耕种之际,递相劝率,各将今秋田亩开浚陂塘,修筑埂岸,毋至后时,追悔毋及”^④。农田水利关系国本,各级地方官有责任筹资兴建,也有义务督促民众自行修治。多数情况下,水利兴建的负担最终还是落在了民众身上,地方官更多的是劝率与督促。

除普通民众分摊水利建设工费外,在水利设施周边拥有寺产的寺院也在官府的督导下出钱出工,协力兴治水利工程。如理宗淳祐十年(1250),福州浚护城河,采取包段浚治的方式,将河道疏治工程分摊给负郭寺院来承担。据刘克庄《福州浚外河》载:

古河缭绕城内外,如人气血周于一身,岁久而淤。(理宗淳祐间知州赵希漭到任后)顾内河才六百丈,而外河加二百余丈,役不可已,民不可劳。乃白于朝,询于众……先是,寺产满百钱者,浚三尺,产二百以下,皆敷。公下令产满百者,浚二尺而已,浚内河者半之。负郭三邑,寺产三百以下,余十县,寺产六百以下者,皆免敷。遂画界限,度丈尺,总以十大寺,而余寺分隶焉。近寺募工,远寺助费,率以产满百者助二工。按籍给由,下之十县。以僧督僧,吏拱手不得与。寺尤远而输,未至者先兑库钱。^⑤

整个浚河工程全部由寺院承担,官府不费一钱一粟,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福州地区佛教经济的发达程度。其实福州内外河道的治理一直都是由寺院承担,只是工役分摊不均,导致矛盾突出,效果不佳,即所谓“大寺苦数役,小寺不免敷,而中寺殷实者以贿吏免,强有力者以挟贵免”。赵希漭到任后,明察秋毫,严格按照寺产多寡分摊工役,“免敷者沾实惠,应敷者无后言”。众寺相互协作,使“百年水道唾手而复”^⑥。

三、宋代水乡食利民户通过借贷众筹建设资金

水利工程的兴建耗资巨大,为了筹集充足的建设经费,各级政府往往会设法动员广大百姓出工捐资。官方一般通过劝说、利诱甚至强制等手段将部分民间财富化为建设资金,其中食利民户自筹建设经

①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一二四,第7533页。

② 楼钥:《楼钥集》卷五六《慈溪县兴修水利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09-1010页。

③ 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六一,孝宗淳熙十一年六月条,中华书局,2019年,第1404-1405页。

④ 朱熹:《朱熹集》卷九九《劝谕筑埂岸》,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064页。

⑤ 刘克庄撰,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九〇《福州浚外河》,中华书局,2011年,第3841-3842页。

⑥ 刘克庄撰,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九〇《福州浚外河》,第3842页。

费便属于强制性质。所谓食利民户,是指水利工程周边共享其利的民众,文献中称之为“食利之民”“食利人户”等。由于水利的兴废直接关系到这些民户的切身利益,因此他们有意愿、有责任积极维护和兴修当地的水利工程。在建设经费不足的情况下,由他们分摊自筹建设经费也就成为必然选择。宋代法律明确规定,农田水利修治之费,由食利民众承担,如孝宗淳熙四年(1177),赵恺在《开东湖事宜状》中写道:“在法,农田水利并以食利众户共力修治,合是民间出财。”^①王十朋在与他人讨论灾年兴利的问题时,也提到当时法律关于食利人户分摊水利工役的规定。他说:“风潮所坏海塘,如前日上虞县陈请之类,依法合以食利人户修筑。今滨海之民既被灾伤,富者困,贫者饥,况工役广大,必难取办于食利之所,不免役他乡之民,然又不能无怨。”他认为虽然依据国家法度,海塘等水利工程的修治应由食利人户来承担,但由于受灾严重,“工役广大”,食利户难以承受,因此建议提举官“委自令佐,或以官米,或诱富民,随多寡出谷或米”,募民兴工役^②。从王十朋的书信中可以知晓,由民众,尤其是所谓的食利人户修筑水利是法律明文规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食利民户自筹成为水利建设经费筹集的主要模式。

因为有律法条文作为依据,各级官员便大张旗鼓地要求民众承担水利建设工费。如徽宗大观二年(1108)五月,针对都水使者赵霖所奏有关河防夫工不足的问题,朝廷在充分考虑“岁役十万,滨河之民,困于调发”等现实情况的基础上,诏令“上户出钱免夫,下户出力充役,皆取其愿。”^③即做了从强制科夫到由民众自愿分摊工费的政策性调整,充分调动民众参与河防工役的积极性。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十月,权发遣临安府黄仁荣奏称:余杭县南、北两湖“东旧有五亩畦,计七十二丈,以杀水势,不致冲突,久废不修。今乡自备桩筏,修治两湖北中隔塘约四里”^④,即由各乡民众自备修复湖堤的物资。汉中山河堰重建于孝宗乾道间,至光宗绍熙四年(1193)夏,大水暴至,“六堰尽决”,官府兴工重建,其经费以民众征输为主,官府调拨为辅。据《山河堰碑》记载,“民输当四倍于每岁之常,乃官出钱万缗为民助”^⑤。由此可知,民众不仅要分摊山河堰大修的费用,还要负担每年的日常修护之费。也就是说,像山河堰这样的重大水利设施的修护重建费用,基本也是由民众自筹。宁宗嘉定五年(1212)至九年(1216),兴化县濠塘泄两次被大水冲毁,之后三兴大役,“靡公私之财计钱五百万。……往时有所作治,率耕者计亩之多寡,而出钱有差,有田者反不与,是以农夫苦之。”^⑥提供重建费用的不是官府,也不是田主,而是辛苦劳作的佃户。

可见,在官方强有力的推动下,大量基层农田水利设施,多由食利民户自筹经费与物资加以修造。若工役繁重,所费巨大而民力短期内难以承担的,则需要向官府借贷常平钱米,所贷钱粮事后需限时归还。如神宗熙宁五年(1072)十二月,农田水利法颁行天下,规定“应有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修贴圩垸之类,工役浩大,民力所不能给者,许受利人户于常平仓系官钱斛内连状借贷支用,仍依青苗钱例作两限或三限送纳,只令出息二分。如是系官钱斛支借不足,亦许州县劝诱物力人出钱借贷,依乡原例出息,官为置簿,及时催理。”^⑦即鼓励民众自筹或通过向官府借贷钱粮兴修水利,也允许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神宗元丰元年(1078)四月的诏令重申了前诏的旨意,称“开废田、兴水利、建立堤防、修贴圩垸之类,民力不能役者,许受利人户具合费用数目,贷常平等钱谷,限三年两料输足,岁

① 赵恺:《开东湖事宜状》,《宝庆四明志》卷一二,《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5150页。

② 王十朋:《王十朋全集·文集》卷二一《与都提举论灾伤赈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29页。

③ 宋徽宗:《都水使者赵霖奏黄河堤岸科夫修筑事御笔》,佚名撰,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一八一,中华书局,1962年,第654页。

④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八之二二,第6158页。

⑤ 查沅:《山河堰落成记》,王昶撰:《金石萃编》卷一五一,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三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541页。

⑥ 郑寅:《重修濠塘泄记》,弘治《大明兴化府志》卷三〇,同治十年重刊本。

⑦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一〇〇,第7508页。

出息一分。”^①从措辞到内容几乎与前诏保持一致,只是将借贷的利息从二分减为一分,以便鼓励民众更积极地筹资兴利。

南宋建立之初,在基层农田水利兴修方面,延续了北宋的做法。如高宗绍兴元年(1131)九月,诏令“逐州守臣将缺坏圩岸疾速措置,如法修治,人户耕种。内合用功料并见佃贫乏无力人户,并许取拨常平钱米,量行应副,及借贷支使。”^②绍兴十二年(1142)十二月,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奏称:“有陂塘塍埂被水冲破去处,勒食利人户并工修作。如有贫乏无力用工者,许保正、长保明,以常平钱米量行借贷;如常平钱米不足,乞以义仓钱米借充。候秋成,以收到花利分三年还纳。”^③可见,虽然措辞各异,不过大体上南宋初期仍按照民众分摊自筹或通过借贷的方式筹措水利兴建资金,这一点在太平州诸圩田的修建中有集中体现。

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闰十二月,措置太平州圩垸钟世明在向朝廷报奏当涂、芜湖两县修建圩垸时称:“今来当涂、芜湖两县人户被水损坏圩垸,乞结甲保借米粮相添,自行修筑。在法,系是农田水利,民力有不能办者,合依宣州体例借贷,具数保明申提举常平司外,有万春等圩垸人户乞官为雇工修筑。”他建议由民户向官府借贷钱粮自行修造。不过由于工程浩大,民力难支,他又援引法规,请求依照宣州成例,由官府代民户雇工修筑。为进一步说服朝廷雇工修造,钟世明详细罗列了两县圩岸修筑的规模与数据。他指出:“芜湖县万春、陶新、政和等圩垸三所,共长一百四十五里有余,合用九十六万一千三百四十四工。当涂县管圩垸一所,系广济圩,长九十三里有余。其圩与私圩五十余所并在一处,坐落青山前,各系低狭。埂外面有大埂一条,包套逐圩在内,抵障湖水。”所有这些官私圩岸、大小田埂,都需要重筑,显然是民力所无法承担的。于是他巧借民意,提出大小圩埂分别修治,即官方雇工修筑外围大埂,民户自行修筑圩内小埂,如其所言:“今来逐圩被水损坏,询访人户,只修外面大埂,不惟数倍省工,委是可以抵障水势。所有腹里圩垸或有损处,听人户自修。寻取会到逐县被水修治官私圩垸体例,系是人户结甲保借常平米自修。……圩垸体例,不以官私圩,人户等第纳苗租钱米充雇工之费。官为代支过钱,年限带纳。”^④

本来这一官民合力修筑圩岸的建议可行性很高,但由于有民众独自承修的先例,导致该建议很可能难以落实。即按照成例,不论官圩私圩还是大埂小埂,均系由民众结甲借贷常平钱米自行修造,这显然与钟世明请求官府雇工修筑的初衷有较大差异。于是他再次重申修筑的难度,以期说服朝廷雇人修建,以便在提高工程效率与质量的同时尽可能减轻民众的负担。他称:“今来芜湖县申:独山、永兴、保城、咸宝、保胜、保丰、行春圩北,其地圩垸被水冲破打损至多。若只依系保借粮米,将来修筑不前。”也就是说,如此繁重的工役,如果仅靠民众借贷修筑,会影响工程进度。更何况其中的“咸宝一圩,被水损坏,冲成潭缺”,所费工力,数倍于“独山等圩垸损坏,尤见工费不同,委是民力难办,乞官为雇工修筑。”因此尽管打破惯例的难度极大,他还是坚持由官府出资雇人修筑。并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即“上件圩垸欲各依例结甲随苗借米外,更据下户田每亩与钱一百文省,令自修筑。其咸宝圩垸潭缺处,据合用工数,欲乞官和雇人工共同修治”^⑤。对上述诸圩垸的修筑,分三种情况来处理,其中工役最大的咸宝圩由官方雇人修治,其余的由民众依例结甲借贷修筑,而对于经济实力最差的下户,由官府每亩额外补贴一百文钱,以供其自行修葺之费。由钟世明的奏请可以看出,江南地区的圩田建设经费主要由民众自筹或向官府借贷。即便工役繁重,费用浩大,地方官极力申请,最终获得官方支持的难度也很大。而该奏章援引的法规和成例也表明,民间力量出资是基层水利建设经费最主要的来源,这既是食利民户应尽之义务,也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九,元丰元年四月壬戌,第7069页。

②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一〇七,第7516页。

③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三十八,第6106页。

④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五〇,第6142-6143页。

⑤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五一,第6143页。

是官方主导下的农田水利建设的基本模式^①。

四、宋代南方乡民自发集资兴修水利

在以农为本的传统社会,农田水利等工程建设事关国计民生,不仅各级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建设,普通民众更是视水利设施为安身立命之本,无论是江南水乡还是干旱的北方地区,相对于其他工程建设,农田水利都是民众参与度最高、贡献最大的建设领域。普通民众不仅提供水利兴修所需的劳动力,而且自发捐献建设经费与物资,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支持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水利设施建设。

宋代文献中关于民众自发集资兴建水利设施的例子有很多,如梓州路下属的合州因为“枕二江之口”,故而形成了“众水之凑”“水复济水”的复杂水文环境。每逢雨季,洪水泛滥,“坏官寺,损民舍,病缠一郡,久而未瘳”。英宗治平间,光禄卿单某到任后,“按视地势,谋建大防”以绝水患,“然以功役用度之繁,亦不敢辄造”。于是号召民众参与兴建,属县百姓闻风而动:“吏民莫不响应,乐输竹木,愿助糗粮,籍计其费,沛然有余。”由于得到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持与积极捐助,一条高、宽各六丈,长达七十丈的防水大堤,在“民庶力助,不耗公帑一毫”的情况下,仅用六十天就修建完工^②。如果没有民众的积极参与和捐资,仅靠财政拮据的地方官府,是很难如此高效率地完成的。另如徽宗时江阴县修复黄田闸,当地民众出资购置建材,雇佣工匠,积极参与其中。据蒋静《大观黄田港闸记》载:大观四年(1110),县令徐充欲重建黄田闸,苦于经费无所出,“会岁事稍登,人乐自效,得钱三百万以市材命工”,不仅江阴民众“皆乐事而劝功”,毗邻的晋陵、武进两邑之人也“相与戮力”^③,共同参与黄田闸的重建工程。徽宗宣和间,余杭县应民众之请浚治南湖,所用工料、钱粮、人力也由当地百姓承担,据成无玷的《开湖记》载:该工程用“石之工九百九十,役庸万有六千三百,用缗钱四十三万,皆函下之氓计亩乐输”,官库无一毫之费^④。这种在官府引导下由民众自发出钱出力兴修水利的做法,在官无重费而民利可兴的情况下,达到了官民两便、双赢互利的效果。

南宋时,随着地方财政更加困难,由民众自发集资兴修水利的现象愈发普遍,很多重要的水利工程都是在民财的支持下修复的。如温州平阳县沙塘斗门自绍兴中由当地官户吴蕴古主持创建后,中间几次废坏,均由民众集资重建。最初在孝宗乾道二年(1166),“海溢,塘堤斗门尽坏。”后由三乡之民集资重建,而后又十年,“木腐土溃,水得纵泄,众复大恐。”县令赵某等“益求巨材,仍旧规而辟之,凿石为条,……柜之表里,牙错鳞比,以蜃灰锢之,又作亭覆焉。”建设所需经费,除“请于郡,得钱二十余万”,其余大部分由当地食利民户集“资以佐之”^⑤。另如度宗咸淳四年(1268),在莆田地方官的倡议下,木兰陂重建斗门,当地民众通过集资的方式提供建设工费。据林希逸记载:木兰陂有三大斗门,其中林埔斗门“创于元祐而坏,修于庆元又坏,盖其废久矣。”咸淳中,知州倡议重建该斗门:“众曰,非芝楮六万不可。公曰:‘郡家任此,第为之,勿惮费。’于是里人作而言曰:‘公意美矣,吾侪奈何?’共哀万五千以经其始。”^⑥在官

① 关于南宋时期江南圩田开发、创建及管理的情况,沈世培在《南宋江南圩田开发中政府公共职能探析》(《中国农史》2017年第2期)一文中有详细具体的考察,不过作者的着力点主要放在地方政府在圩田开发中的管理职能,并未涉及普通民众在水利兴建中的贡献。

② 赵颙:《单公新堤记》,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72册,第320-321页。

③ 蒋静:《大观黄田港闸记》,杨印民辑校:《宋江阴志辑佚》卷一〇,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37-338页。

④ 成无玷:《开湖记》,雍正《浙江通志》卷五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20册,第415页。

⑤ 徐谊:《重筑沙塘斗门记》,雍正《浙江通志》卷六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20册,第533页。

⑥ 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一〇《重造林埔斗门记》,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第462页。

方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民众主动集资捐助成为地方水利建设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

综上所述,普通民众之所以参与基层水利建设经费的筹集,既有官府督劝诱导的因素,也是自身利益驱动的结果。水利设施与农业生产的丰歉直接相关,在传统农耕时代,水利兴否的问题,大到一朝一代的国运走势,小到一家一户的日常温饱,都关涉其间。因此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普遍高度重视水利设施的创建与修护。相对于其他公共设施,广大民众对水利工程建设参与的程度最高、也最充分。这既与官方基于社会稳定与赋税征调的考虑而积极倡导督劝、民众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积极主动地参与密切相关,也与水利工程需要巨额经费与大量劳动力投入有关。宋代北方的河道治理、南方的圩田及捍海堤塘等大型水利设施的创建维护所需的资金和劳动力,除了部分由官方筹调外,大多数出自民间,尤其是劳动力与建筑材料,多从民间征调。在这些大型工程建设中,广大普通民众一般是在官方以行政命令甚至强制手段的督劝下参与的,因此大多属于被动参与。大型水利工程之外,那些与农田灌溉息息相关的陂塘堰闸等中小型水利设施的创修,则主要由食利民户主动参与并筹集经费。而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占宋代民间力量绝大多数的基层农户都为水利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两宋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的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物力、人力支持。

结 语

受传统历史书写模式影响,普通民众的显示度远逊于乡村社会上层的富民乡绅等民间精英阶层,而作为个体的民间精英受关注的程度超过了作为群体的普通民众。在关注重要历史时刻与关键历史人物的史学范式下,作为民间社会中的关键少数,富民乡绅们的一次或数次贡献,可能被无限放大,进而成为世代传颂的楷模,被历史书写者反复追记,如成功修建木兰陂的李宏等。而生活在历史日常中的基层普通民众,其作用与贡献则很少会被发现与铭记。但正如历史的主体是由一个个“日常”构成一样,宋代水利建设经费的筹措主体,也是一个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掌握大量财富的富民乡绅,也许会在某项重要的工程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但这种贡献在难以计数的农田水利创修中所占比例不大,绝大部分建设事业的费用其实是由广大基层普通民众来承担,虽然每个个体的贡献可能微不足道,但积少成多,就经费总量而言,毫无疑问,由下层普通民众提供的建设资金,远大于来自富民阶层的捐献。

(责任编辑:胡文亮)

[参 考 文 献]

- [1] 林文勋. 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研究[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 [2] 廖寅. 宋代两湖地区民间强势力量与地域秩序[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3] 刁培俊. 宋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J]. 社会科学辑刊,2004,(2).
- [4] 谭景玉. 宋代乡村社会的多元权威——以民间纠纷的调解为例[J]. 江淮论坛,2007,(1).
- [5] 陈其泰. 史学:展现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新视角[J]. 人文,2021,5(1).